

7405

应城文史

第二十四辑



政协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应城文史

第二十四辑

政协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应城文史

第24辑

主 办：政协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准印证：〔2004〕鄂孝内图字第27号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8.5 印 数：2500册

字 数：200千字

2004年12月印刷

应城市教育印刷厂承印

目 录

长河钩沉

- 蒲骚文化纵横谈 魏志才 (1)
- 欧阳修的应城情 朱木森 (39)
- 张居正应城行 朱木森 (45)
- 应城置县的由来 杨家清 (51)

古城新说

- 孔庙维修琐记 知 日 (59)
- 短港水库建设历见 梅昌鼎 (69)
- 从私家花园说到人民公园 宋纯清 王槐松 (83)

往事漫忆

- 清末推动应城膏盐业发展的两件议决案... 知 日 (95)

清末民初本籍留学生剪辑	士 心 (110)
私塾漫谈	徐春华 (125)
我在中原突围时的一段经历	陈孟明 (133)
民国时期的应城县银行	张光祖 (142)
记应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	周荣华 (152)
兴盛一时的合营合生烟杂商店	闵培清 (162)
应城广播初创的艰难历程	吴学超 (171)
建国后我市(县)几种主要传染病防治概况	张显武 (178)
我经历的“大跃进”	陈世高 (186)
说说应城的共产主义新村	胡 文 (207)

闻人故事

几位业绩昭彰的应城精英	魏志才 (220)
万藻卿和他的《古峰诗草》	胡 文 (237)
黄埔军校的应城人	彭焕侠 (245)

蒲骚文化纵横谈

魏志才

富有应城区域特色的蒲骚文化，其发源应追溯到5,000年前三苗遗裔氏族部落的土著文化，即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。在楚文化转化并融入汉文化的共性后，随着应城置县筑城，承袭蒲骚文化并发展为蒲阳文化；蒲阳文化属汉文化体系，后延至明、至清、至今。同时，我们还看到：由于应城特有的温泉资源和膏盐矿产资源，形成了蒲骚文化的两条支流，一是以汤池温泉形成的灵泉文化；一是以十里膏城

形成的膏盐文化。由此可见：应城区域文化，起源于门板湾文化，昭彰于蒲骚文化，延袭于蒲阳文化，其支流则是灵泉文化和膏盐文化。

现对应城以蒲骚文化为主干的区域文化作一探视，管窥之见，敬祈仁人志士斧正；并借以抛砖引玉，共谋蒲骚文化的弘扬！

三苗遗裔的门板湾文化

近世发掘出土的门板湾故城遗址和四龙河陶家湖故城遗址，为我们探寻和审视早在 5,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亦即原始社会晚期应城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。

据考古发现：门板湾故城遗址和遗迹，在今城北办事处星光村，位处大富水西岸，离中心城区约三华里；陶家湖故城遗址在今四龙河中段，离京山屈家岭 20 华里，距中心城区 40 华里，属大富水水系。

两处故城遗址遗迹表明，它们同属屈家岭文化体系，但其文化内涵在许多方面较屈家岭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城池，门板湾城池南北最大长度 550 米，东西最大宽度 400 米，城池总面积 20 万平方米，规模宏大，城墙由夯土筑成，西城墙现仍高出原地面 3~5 米，东垣 1~1.8 米。根据城垣基脚下出土的喇叭形厚胎杯、鸭嘴状

鼎等物推断，此城始建于原始社会晚期，距今已有 5,000 年之久。遗迹还表明：城垣外有环城濠，沟口宽 5.9 米、深 2.5 米，是这座城垣的护城河。考古学家据此认定：这里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形成环濠聚落，即是由濠沟环绕的原始部落聚居地。这样的聚居地，不仅能防御洪水、猛兽的侵袭，还能防御异姓部落入侵，保护本部落人群。陶家湖故城遗址，位于陶家湖与四龙河交汇处的四龙河遗址内。西距汤池 2.5 公里，城池呈椭圆形，南北最大距离约 5,000 米，东西宽度 850 米，总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。城池为土筑城垣，残存城垣高出地面 1~4 米，城垣外有濠沟，自然地作护城河。与门板湾故城同样，已形成环濠聚落。而屈家岭遗址，没有城池和环壕；居住在屈家岭的人群尚属丛山中的村落聚居。

门板湾、四龙河的先民，来自何方？据《楚文化志》记载：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，是传说中尧、舜、禹之世的南方大族，又称“有苗”，活跃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，与华夏部落集团相抗衡，先后诞生了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。门板湾、四龙河的先民当属三苗部落的人群。由于筑了城濠，这个部落的人群过着稳定而又平安的生活，并以其智慧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。

在门板湾遗址，出土了大量实物。

4 长河铸沉

从出土的谷物来看，这里已进入农耕时代，农作物以稻类为主。伴随着出土的磨制精良的收割用的石镰，砍伐用的石斧，臼米用的石锥，农业文化在此已见端倪。

这里发掘出土的房屋内已有工整的火塘，表明这里的先民已能利用火服务于生产与生活，出土的陶器——陶杯、陶豆、陶罐、陶盘、陶碗等，作烹饪和贮藏液体食物用，初放饮食文化异彩。

出土的兽骨，一方面说明这里的人群除农耕外还有渔猎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兽骨也可能是家禽骨骼。这就是说，这里已发展了养禽业，养禽文化开始萌芽。

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红灰彩陶纺轮，说明这里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，家庭作坊已具有一定规模，开始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。彩陶纺轮轻薄，纺织出的纤维也一定会很精细，这是纺织已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。应是当时先进的纺织文化在手工工艺方面的物质文化成果。

出土的红陶杯、陶鼎，与外地出土的原始社会早期粗笨的陶器相比，显得薄而精细，且图案丰富，如陶器饰纹有绳纹、网络纹、偶旋纹，彩陶纺轮上还有近似太极图饰纹，这不但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描绘花纹装点生活的情趣，而且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了属于精神文化成果的绘画艺术！

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：当考古学家在西城垣北段进

行探方解剖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座被古城墙掩埋却保存完好的大型房屋！

这座房屋坐南朝北，长方形，四开间，中间两间较大，房屋四周有院墙。房屋东西通长 16.2 米，南北最大宽度 5.5 米，总面积 83 平方米，为土坯砖砌成。现存墙壁最高处超过 2.1 米，墙厚 38 ~ 55 厘米，墙体与地面垂直，墙角是标准的 90° 直角。四间房内各有一个正方形的火塘，房屋的四壁还有 7 个窗户，两间大房的窗户在南壁正中，窗户的下沿离地面仅 10 厘米左右，为落地式窗户。在窗户的四周还有凹形槽，表明窗户上装过木框。墙体有一部分是用土砖垒砌起来的，上层砖压着下层砖的缝隙，砌法十分先进；墙体上还涂有一层粉泥，使墙壁平整坚硬，且起着美化和防潮作用。这座房屋，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高台建筑。当时的人们为了防潮，防风雨，才垒起高台并在其上建筑房屋。房屋的设计与建筑，表明了三苗遗裔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。房屋内规整的火塘，表明先民们对生活细节的要求严谨。

所有这些遗迹遗物，充分说明了聚居在门板湾的三苗后裔，在创造了原始农业文化的同时，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和手工艺、建筑工艺等诸多文化。足以与华夏文化媲美，且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楚文化。因为这时的熊姓楚人，还栖息于睢山与荆山之间，

过着“辟在荆山，篳路蓝缕，以处草莽……”的散匿生活。无怪乎楚在崛起、强大时，采取了“抚有蛮夷，以属诸夏”的发展路线，兼收并蓄蛮夷文化（包括三苗土著文化）的精华而弘其才，这也是楚文化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。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，其内涵极其丰富，弥足珍贵，是应城区域文化的源头。

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

蒲骚之名，最早见于史籍《左传》：“莫敖纽于蒲骚之役”，“郢人军于蒲骚”。《集韵·萧韵》：骚，蒲骚，地名；杜预注：蒲骚，郢邑；陆德明释义：骚音萧（xiao）。《辞海》在释文中指出：“蒲骚，在今湖北省应城县西北。”清·嘉庆一统志亦载：“蒲骚故城，在今湖北应城县西北。”归属应城区域。

据此考证：蒲骚，地名，因傍于沈家湖，湖中盛产菖蒲，蒲叶长出水面约3~5尺，轻风吹拂，蒲叶骚动，发出萧萧之音，因而得名“蒲骚”。

郢国为嬴姓之国，是商王朝所建封国；与郢国既同宗主又同人文的权国（在今荆门），是商王朝国君武丁后裔，同为公元前12世纪所建。距今已迄3,200多年。

郢国（辖有今京山、安陆、应城、云梦等地带）在

建国后，即在国之东陲设城寨于蒲骚。这是蒲骚故城兴起的源头，迄今至少有 3,000 多年的历史。后世在离古属蒲骚地的田店镇不远的巡检司地带，发掘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酒器——爵和斚以及提梁鸢卣等文物。证实商代有贵族居住于蒲骚地，蒲骚文化即在商周华夏文化中开始孕育。

“蒲骚故城”的名声大为张扬，蒲骚文化得以长足发展，则是在春秋中叶早期楚伐随、郢之役以后。据《左传》载：“鲁桓公十一年（公元前 701 年），楚武王将与貳、轸两国联盟，郢国陈兵于蒲骚，并联合随、绞、州、蓼等国以伐楚。莫敖屈瑕率楚军与郢师战于蒲骚，郢军败绩。遂与貳、轸结盟而还”。

在《楚国战事简编》中，对蒲骚之战的始末叙之较详。楚武王三十五年（公元前 706 年）侵随（随国，今随州），开始经营汉东。为了分化汉东诸国，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，于楚武王四十年（公元前 701 年），使莫敖（大将军）屈瑕去汉东拟与貳（今应山）、轸（今应城西南）两国会盟，貳、轸间的郢国（今安陆）国君郢子，为阻遏楚国势力东渐，立即调集重兵驻守蒲骚（位于今应城田店附近），并联合随、绞（今谷城北），州（今监利东），蓼（今河南唐河县南）四国之兵共谋伐楚，企图阻扰楚与貳、轸会盟。主帅屈瑕闻讯大惊，副帅斗廉

计议：乘随、绞、州、蓼之兵未到之际，你率军把守郊郢以防四国之援军；我以精锐之师快速行动直捣蒲骚守军。屈瑕拟卜卦问吉凶，斗廉说：“卜以决疑，不疑问卜？！”屈瑕从其议，果断分兵行动，斗廉率千名精锐之师，神速出动，如天兵突然降临在蒲骚城附近时，已是夜幕降临。斗廉不等郢军发觉，神速夜袭蒲骚，一举击败郢师。随、州、绞、蓼闻郢师已败，未与郢联合。斗廉率军在蒲骚击溃郢师后，屈瑕大喜过望，不仅顺利与貳、轸结盟，且貳、轸即归服于楚。同时，郢、绞等国也与楚订立了城下之盟。

“蒲骚之战”是楚国争霸中原的著名战事之一，是楚国东渐大捷的首战战场，奏响了经营汉东的序曲。在楚武王“克州、蓼，服随、唐”的基础上，楚文王相继征服汉、淮之间的一些封国，并不失时机地进军中原，实现了“观中原之政”的宏愿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土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强国，七雄五霸之一。

“蒲骚之战”不仅使楚军战斗力增强，而且使应城地区成为战国时期的古战场之一。近世在境东南的长江埠庙湾清理出4座战国残墓。出土的器物有陶鼎、陶壶、陶豆、陶敦、陶簋、铜戈、铜剑、铜削刀、铜箭、铜簇等50余件。陪葬器物表明，这里是战国时期的墓群，墓中掩埋的是楚国战死将士的骸骨。同时还有余上砖瓦厂

的古墓葬，乱葬岗遗址、万河遗址、张家台遗址、鲁家塆遗址，均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、遗存。这充分说明应城地区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场。

当时，楚武王特别珍爱蒲骚，因为这里是奏响东渐序曲首战大捷之地，楚武王五十一年（公元前 690 年），老境已至的武王，为了社稷，毅然决定躬临战场，再次伐随。大军渡过汉水，武王心力交瘁，死于进军途中的楸木之下。《雍正应城县志》载：“楚武王熊通在第三次伐随战争时，死于军中。埋葬楸地（即今应城古楼三孤冢）。”三孤冢古墓现尚在应城县南陈河镇王郑村王家湾背后的台地上。古墓五米以下仍为五花土，且未发现盗洞，三冢并峙，似若小山。（有人说是随楚武王在伐随战争中，卒于军中的从征诸臣，由当地楚民挖墓祭葬。）在楚武王熊通逝世后，楚民在三孤冢附近的马旺咀建造了一座庙，并以蒲骚为庙名，塑供楚武王像，以祀祭吊（据奚志稿）。开启了本地域祭祀文化的先河。

经过“蒲骚之战”后，郢、轸、蒲骚等地均为楚国所有，并化为楚族、楚民。这时正是楚文化的茁长期，蒲骚地最先受到楚文化的浸润。并以其蒲音之文化内涵，很快纳入楚文化体系、洋溢出蒲骚文化的清香，成为应城人历千年不衰的情结。明代应城诗人华清作《登古城诗》，诗中云：“郢人构四国，军此蒲骚城；……霸国今

安在，千载有余情。”清朝应城著述家程大中作《蒲骚故城》诗：“郢人昔军此，州蓼纷相聚；抗楚亦何愚，要盟毋乃误；群鸟散惊弦，安能复回顾；空闻宋玉悲，诂解莫敢怒；往迹已苍凉，游人自来去。”清代乾隆举人孙姓《咏蒲骚畝诗》：“一片膏腴地，村人尽力耕；何知郢楚事，独自闹蒲城。”清代李宗简还撰写《蒲骚人物志》二卷，记述蒲骚人文（可惜失传）。

由上述可见，蒲骚文化是以商周中原文化为胚胎（含土著三苗文化的基因），接受楚文化的长期哺育，合流而成就为应城区域特有的异彩纷呈的蒲骚文化。

首先是以蒲为流的蒲骚文化，以多种形态表现出诸多楚文化特色。在祭祀风俗方面，特别是在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后，后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凭吊。《辞海》有载：一、“柳眉低带泣，蒲剑说初抽”。二、“民俗以端午日以蒲为剑悬诸门首以避邪”。此民俗在应城区域自楚亡至今传承不辍。因应城沈家湖盛产菖蒲（沈家湖没为平畴，菖蒲继产于应城南乡湖区）。每年的端午节前，正是盛长菖蒲的季节，即有 15 岁左右的女童，拾掇菖蒲上市叫卖：“卖菖蒲、艾哟”。市民即争相购买，以蒲叶为剑（形同战国青铜剑），数枝一扎，悬挂于大门的门楣之上，既作为凭吊屈原之物，又作驱邪之用。又因蒲叶和艾一起，端午过后取下来，用温水浸泡，其

汁水能治疗疥疮。这是民俗中蒲文化的形态。而菖蒲叶，在端午节可包粽子，不仅可供食用，清香可口，构成饮食文化，而且还可将粽子投入河湖，以供鱼食，避免鱼食屈原之体，以表世人对屈原爱护之情。还有，以蒲叶用作包装，小叶供杂货店包卖辣萝卜丝等酱制品，大叶（茎）谓之“标草”，作绳用，捆绑大宗货物。还有以晾干后的蒲叶做成的团扇，谓之蒲扇，至今尚有人使用。作夏日睡垫用的蒲席，作跪拜用的蒲团，包裹用的蒲包等，这是蒲文化的物质文化形态。蒲骚文化中的“蒲”，不仅有着精神的、物质的诸多文化表象，而且体现出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异彩纷呈。

楚文化最主要特色之一是对凤的信仰、钟爱和崇敬。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。在后世楚人的心目中，凤仍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神鸟。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，对凤也极为尊崇，自春秋传承后世，连绵不息。在民俗中，如初出阁的新娘，必头戴“凤冠”（以凤身制作成的头冠），身穿“霞帔”（帔巾，裙带，绣满凤身的花纹），足穿绣凤图案的“凤鞋”；在新房的门楣上书写“鸾凤合鸣”或“鸾凤呈祥”，以凤为荣，以凤示吉。时至民国年间，应城城关的朱三婆、宋菊凤等，仍以刺绣凤花的绝活而著称。在应城区域的松林岗，有以凤为地名的“凤凰咀”。而以凤取女孩名字的，如菊凤、凤仙、

冬凤、春风、雏凤、凤珍、凤兰、风华、芝凤等则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

以屈（原）宋（玉）为代表的文学辞赋，在应城深扎其根，润育蒲骚文化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记载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”又据《楚纪》：“宋玉，楚人……，尝侨居蒲骚，作《九辩》以述其志”。“景差，楚人，尝以事被放至蒲骚见宋玉”。说的是楚国处于被秦灭亡的前夕，宋玉侨居在蒲骚之崎山（现应城田店河对岸），深感自己一生不济，又伤感楚国国政衰微。时为楚顷襄王乐曲大夫的景差，也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文学侍臣。他在被放逐的途中，复转云梦，来到蒲骚，会见了侨居在崎山的宋玉。宋玉和景差相聚于蒲骚之崎山，畅叙了离情别衷，又忧患着楚国的衰微。在一片忧国忧民的沉痛哀叹中，宋玉完成了他的名篇《九辩》，景差也成就了他的名作《大招》，他们以其文学辞赋创造和传扬了楚文化的历史精华！他们的辞赋是在蒲骚完成，故世人喜赞：“孰云蒲骚城小，楚辞夫子墙高”。

古往今来，屈宋辞赋对应城诗人的才智和诗兴启迪甚深。其中的代表是清·道光年间的田园诗人万瑞旒（字澡卿），他著有《古峰诗草》十卷，录诗702首。名家吴鼎元评其诗：“寓清新俊逸于沈博绝丽之中，其胎息原